



资中筠自选集

望觀天下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中筠自选集

望觀天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观天下 / 资中筠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0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5-5

I. ①坐… II. ①资… III. ①国际问题—研究②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50②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40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编: 256401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53千字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

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立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

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

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人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

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

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

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目 录

自序 / i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轮美国金融危机 / 001

另一种主流的声音 / 022

——评吉米·卡特《美国的道德危机》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 028

旧话重提 / 041

——伊拉克战争前的思考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 050

——美国总统的个人作用

从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内政外交的演变 / 056

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 / 069

——《美国新闻史》读后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 080

百年风云启示录 / 089

——《冷眼向洋》书系总绪论

美国强盛之道 / 115

讲和也需要英雄 / 131

——由拉宾之死想起的

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 / 136

——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 156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 179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 189

——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 / 219

——兼论“中国例外说”

缓慢的解冻 / 225

——尼克松访华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 257

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 295

美国研究之我见 / 322

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 / 325

——1945—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的起伏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轮美国金融危机

自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举世瞩目，议论蜂起。本人对金融、经济纯属门外汉。不过从我国各种媒体评论中感到有不少说法容易误导公众，今根据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点澄清：

一 金融泡沫和经济危机历史悠久

（一）建国之前就有金融危机

美国有两样事物是先于美利坚合众国立国就存在的：一是大学，二是证券交易以及股市泡沫、金融危机。人们经常谈到的1929年大萧条绝不是第一次。早在英国人占领纽约之前，荷兰人大约于1620年最早来到纽约，所以纽约原来称“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荷兰人把他们发明的股份制和证券交易也一起带来，而且经历了股市危机，即有名的“郁金香泡沫”。华尔街（Wall Street，墙街）之命名即来自荷兰人为防英国人自北面进攻而筑起的

墙。但是英国人不从北方来，而是于1664年从南方海上进攻，占领了该市，改名新约克(New York)，即纽约。那道墙于1698年拆除，留下一条街，称为“墙街”。所以华尔街连同“证券交易”都是荷兰人的遗产。在美国独立之前的一百年间，在这里已经经历过多次投机—繁荣—泡沫—危机—整顿复苏—繁荣的循环。独立战争中纽约几乎完全被毁。后来又重新恢复，逐步取代费城，成为金融中心。

(二) 建国后一百年间发生的周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

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1789年华盛顿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这几年是一个经济蒸蒸日上的时期，然后经历了几次大小危机的周期，重要的有：1792、1825、1836（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延至1843年）、1857年。1861—1865年打了一场南北战争，实施战时经济，其间既有萧条，也有繁荣。战后1873年再一次股市崩溃。19世纪最后一次危机是1893年。

(三) 从混乱走向有序

在建国前后近二百年中，华尔街就像一个大赌场，每次繁荣—衰退的周期都是在混乱无序、恶性竞争、坑蒙拐骗乃至权钱交易的腐败中完成。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时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被大投机家所裹挟。但是就在这乱象丛生的发展中，渐渐走向规范，逐步有了一套游戏规则，大多是竞争对手们到某一个阶段意识到需要避免两败俱伤，自己在一起讨论制定的。例如建立“清算中心”、引进会计制度、及时发布指数（道琼斯指数），等等。政

府有关法律的出台是在其后，或只是承认既成事实。到 19 世纪末为止，政府面对华尔街的确是处于弱势。一些叱咤风云的大老板身边大多有一两个为自己服务的国会议员或法官。总统遇事也得求大老板帮忙。

如同中国历史的“治”“乱”周而复始，美国的市场经济亦如此，但是除了南北战争之外，它的“治”与“乱”不是在打打杀杀中而是在市场博弈中进行，斗智斗勇，是文斗不是武斗。“天下大乱达到大治。”乱世出枭雄，或奸雄，或英雄。华尔街出了许多骗子、恶棍，同时也出了许多有眼光的金融家、企业家，或者集各种人物于一身的人。其中一位最重要的跨世纪人物是摩根（J. P. Morgan）。他的产业包括铁路、钢铁、银行，后来又收购了卡耐基的钢铁公司，成为最大的垄断集团。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观念，把“诚信”带进华尔街，使其发生根本变化。他说过金钱、权势都不如品德重要，这是财富买不到的。果然，他用他自身的信誉解救了许多危机，克利夫兰总统、老罗斯福总统都曾借重于他。1893 年美国因黄金白银之间的投机引起的危机，使欧洲大量抛售美国债券，美国黄金如水泻般流向伦敦，财政部束手无策。摩根说服克利夫兰总统听从他的意见，并凭他个人的市场信誉在华尔街和伦敦之间运作，使黄金回流，拯救了美元，实现了他对总统的承诺。

二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从危机周期的历史来看，新发明、新产业与股市投机和泡沫是